

城人物简介

蔡昉,1956年9月生于北京。经济学博士。曾在国外多所大学任访问学者。中共十七大、十八大代表;第十一届和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。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、学部主席团成员、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。

20世纪90年代以来分别获得“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”、国家级“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”、出国留学人员杰出成就奖等表彰。先后三次为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进行讲解。近年获第二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、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等。

城个人观点 中国城市化特点

各国城市化道路可以各具特色,城市管理方式也各有千秋。例如,中国今后的城市化一个重要的特点,就是把已经在城市务工经商和居住的流动人口,通过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使其成为真正的市民。所以,中国城市化的过程在一段时期内,其实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。此外,中国城市化在改革开放以前被耽搁了很长时间,后来具有“补课”的性质,因此中国的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,这也带来一些特殊性。在一定时期内,我们或许不要把福利水平提得太快,而是与国情相适应,关键是公平、机会均等。



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

曹堂 摄

近来公众对养老问题格外关注,蔡昉就此提出自己看法 延迟退休不是“最好的选项”

本报记者 陈 杰

蔡昉先生是位既严谨认真又平易近人的学者。记者联系上他后,对于采访请求,蔡先生一口答应,并希望记者把采访问题直接发给他,让他有充分时间考虑后书面作答。“这样可以避免口误,对读者负责。”

“把经济研究当作一种生活方式”,网络上曾经有这样一种说法来评价蔡昉,对此,蔡昉表示,自己并不感到做研究会孤独和寂

寞:“任何时代,做学问的人群中都有严肃、严谨从而极其优秀的,今天的中国也不乏这类学者。很多优秀的研究成果对我激励很大,甚至还有压力。所以,正如马克思引用但丁的话说:‘在科学的入口处,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,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:这里必须杜绝一切犹豫,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’。做研究,付出多少时间、精力,也永远是不够的,也能够得到足够的乐趣和满足。”

从利用“人口红利”转向释放“制度红利”

蔡昉是研究人口问题的经济学家。而中国又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。加上人口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,使得蔡昉的研究必然会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。

蔡昉认为,在特定的发展阶段,生育率下降以后会出现劳动年龄人口增长迅速、劳动力充足的人口转变阶段。这时,通过劳动力投入、资本积累、教育发展和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等,促成一个较高的经济增长率,被

称为“人口红利”。2010年之后,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负增长,中国的人口红利趋于消失。意味着今后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技术进步、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生产率提高。一般来说,人口结构不太可能回归到以前的状况,老龄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。

不过,蔡昉直言,如果能够未雨绸缪,我国适时调整生育政策,即实施尽快放开“二胎”的改革设想,争取把总和生育率(即一个

妇女终身生育的孩子数)恢复到1.8-1.9的水平,可以在20年后有助于提高经济增长率。蔡昉和同事进行的测算表明,以维持现行政策和生育水平的情形为参照基准,通过政策调整,在把总和生育率迅速提高到1.77-1.94并保持下去的情况下,2031-2035年的GDP潜在增长率可以提高7.1%-11.8%,2046-2050年的潜在增长率可以提高15.5%-22.0%。

建议稳妥实施放开“二胎”生育政策

关于放开“二胎”的改革设想,曾在社会上引起不小的波澜,还出现过几次“乌龙事件”。蔡昉以一个学者的角度,从学术研究出发认为,我国人口转变已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,表现为劳动年龄人口绝对减少,老龄化进程加速,并对经济潜在增长率产生负面影响。在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同时,适时

适度地调整生育政策,不仅符合以人为本的时代要求和取信于民的历史承诺,也是通过改革获得制度红利的重要领域。

目前,全国普遍实行了“双独”政策,即夫妻双方皆为独生子女的家庭可以生育两个孩子;有7个省市农村实行了“单独”,即夫妻有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家庭即可生育两

个孩子;有12个省市区取消或放宽了生育间隔规定;有5个省区放宽了再婚夫妇的生育政策。

从现状出发,蔡昉认为采用分步实行“单独”政策向“二胎”过渡的调整方式,略显保守。他建议稳妥实施放开“二胎”的生育政策调整。

户籍制度改革可显著提高劳动力供给

近段时间,养老问题成了热点话题,从延迟退休年龄的传闻到“以房养老”的尝试,说明公众对养老问题的关注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。蔡昉曾经对媒体直言,延迟退休不是今天“最好的选项”。

“我们的确需要未雨绸缪。我认为,看似长期的事情往往是更加迫切的。也就是说最终每个老龄化的国家都要走延迟退休这条路。只是因为中国目前临近退休的劳动力群体是过渡和转轨的一代,由于历史的原因,目前在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中,年龄越大受教育水平越低。例如,受教育年限从20岁的9年下降到60岁的只有6年,他们的人力资本禀赋使得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不利竞争地位。所以,从今天开始就要重视教育和培训。”

“当然,还有一个可以立竿见影通过提高劳动参与率,从而增加劳动力供给的选项,那就是加快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户籍制度改革。目前农民工占到城镇就业的35%,他们的就业行为至关重要。由于户籍制度约束,他们享受社会保障不充分,就业也不稳定,春节期间要返乡过年,每逢经济低迷就有人返乡,40岁以后就要考虑返乡,降低了整体的劳动参与率。因此,如果户籍制度改革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,则可以显著提高劳动力供给。”

蔡昉也承认,户籍制度改革过程中,北京、上海、广州等超大城市有一定的特殊性,改革方式和步骤可以有所不同。“但是,户籍制度改革终究是一个总体的公共政策改革,不应该有例外。我们的确听到一些对户籍制

度改革有所担忧的声音。”

蔡昉提到的这种“声音”大体上有两类。一类是地方政府,特别是市长们的呼声。他们并不反对改革,只是考虑给农民工市民身份所需付出的成本。蔡昉分析说,这种成本估算存在着误区,即仅仅计算成本而不计算收益。实际上,撇开农民工作为劳动力供给的重要贡献不说,他们的直接和间接交税、对社会保障的缴费等等,都是贡献大于成本的。另一类是对于城市环境和基础设施不足导致“城市病”的担心。这种担心很正确,但是不能得出不要户籍制度改革、延缓城镇化或者不要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结论。“城市病”的根源在于公共政策不适应,政府管理能力不足,所以防范“城市病”要从政策入手,提高服务水平,改变管理方式。

【人口学角度谈经济问题】

“中等收入陷阱”

最近,业界和学界都在探讨中国经济发展与“中等收入陷阱”问题,那么,如何通过控制人口规模和调整人口政策来规避可能的风险呢?

蔡昉认为,“中等收入陷阱”是一个经济增长问题,而不是人口问题,虽然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有关系。根据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和教训,在中等偏上收入阶段上,经济增长的条件和因素会发生变化,以往驾轻就熟的政策手段也不再行之有效,进一步的增长遇到格外严峻的挑战。在迄今为止改革开放的30多年里,中国成功地摆脱了贫困陷阱,2012年人均GDP超过6000美元,恰好处在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征途上。而随着2010年之后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减少以及抚养比的上升,人口红利开始消失,潜在增长率已经明显降低。根据测算,中国GDP年增长率将从1995-2010年期间的平均10.3%,可能降低到2011-2015年期间的7.6%,并可能将进一步降到2016-2010年期间的6.2%。

由潜在增长率下降导致经济减速是正常的,只要实际增长率不低于潜在增长率,就不会发生周期性失业,还能缓解资源环境的压力,有利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。

改革不仅要着眼于创造有利于提高潜在增长率的“制度红利”,还要通过坚定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,着眼于防止“中等收入陷阱”。以收入分配状况为例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估算,2012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.474,虽然已经出现一定的下降趋势,仍然属于较高的水平。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的根源,在于资源分配和占有的不均等和不公平,导致居民资产性收入的严重不均等。在蛋糕不断做大的高速增长时期,这些矛盾还没有激化,随着经济增长放缓,如果不能加快速度和加大力度,解决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,及早防止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和体制的固化,问题将越来越难以解决。因此,防止落入“中等收入陷阱”,唯一的出路是加快改革的步伐。